

# 苏辙对北宋文学的贡献

曾枣庄

## (一)

苏辙在北宋文坛的声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就有不同看法。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

阁下又谓三苏之中，所愿学者登州(苏轼)为最优，于此犹非也。老苏先生，吾不及识其人；今中书(苏轼)、补阙(苏辙)二公，则仆尝亲事之矣。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沌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之。故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

秦观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一)苏辙兄弟生前，对他们的诗文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傅彬老认为苏轼为“最优”，秦观却认为子瞻“不及子由”。(二)具体比较了两人文风的不同。轼文如日月，一望可知；辙文如元气，深不可测。苏轼说：“子由之文，词理精确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书子由超然台赋后》)词理精确可知，体气高妙难言，意思与秦观的话相近。(三)所谓苏轼自谓“吾不及子由”，是指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在《记子由诗》中，苏轼也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这倒不是苏轼客气，而是他的真心话。苏轼的诗文虽以豪放不羁、气势磅礴为特征，但他所追求的，特别是他晚年所追求的是“外枯中甘”，“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的境界。苏辙“淡泊”而又“秀杰”的诗文正具有这种风味。

正因为苏辙诗文淡而有味，“有一唱三叹之声”，因此，南宋的陆游也很推崇苏辙。周必大说：

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劝予哦苏黄门诗。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甲申闰月辛未，郊居无事，天寒踞炉如饿鸱。刘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读数过，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于此道真先觉也。(《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

也许正因为苏辙诗文“如元气”，“混沌”难测，所以连周必大这样的“掌制手”，最初也“未识其旨趣”；反复“数过”，才领略出“温雅高妙”。而“诗人之冠冕”的陆游，却把“哦苏黄门诗”作为学诗门径。

关于周必大的这篇《跋》，元人方回曾说：“周益公尝问陆放翁以作诗之法，放翁对以宜读苏子由诗。……或问苏子瞻胜子由否？以予观之，子瞻浩薄无涯，所谓‘诗涛涵退之’也，不若所谓‘诗骨耸东野’则易学矣。子由诗静淡有味，不拘字面事料之丽，而锻意深，下句熟。东坡自谓‘不如子由’，识者宜细咀之可也。”显然方回也是同意苏轼、秦观、陆游的观点的。

明清两代，更把苏辙的文章同其父兄的文章一起列为学习的典范，朱右的《八先生文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储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苏辙之文均在选。茅坤对苏辙作了很高评价，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锋削之思或不如其父，雄杰之气

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道逸疏岩，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亏，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苏文定公文钞引》）

平心而论，苏辙的文学成就远不及苏轼，既不如苏轼全面（他在词、书法、绘画等领域都不足以名家），又没有苏轼那样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但苏辙的诗文也有其自成一家的特殊风格，因此，历代特别推崇苏辙诗文的人也不少。而解放以来对苏辙的研究却很不够，不仅各家所著文学史很少论及苏辙，而且据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三十年来竟无一篇研究苏辙的专论。仅此一点也就足以说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狭窄了。鉴于苏辙诗文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很有必要加强对苏辙的研究。苏辙积极投入了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从文艺理论到诗文创作，都为这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 （二）

在文艺理论上，苏辙以复古为革新，反对时文，主张以西汉文辞为宗师。他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说。

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燕国公张说）、许（许国公苏颋）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闕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迹汉唐，而文章之士，杨（亿）、刘（筠）而已。及公（欧阳修）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呜呼，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偶然也哉！

这是苏辙的一篇简明中国文学史。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先

秦、西汉之文为最好，“后世莫能仿佛”，因此他主张“文律还应似两京”。（《送家安国赴成都教授三绝》）“两似”就是指西京长安、东京洛阳。这正是后来所谓“文必秦汉”的先声。自汉以后至中唐为第二阶段，其间南北朝“文弊极矣”，初盛唐亦“文气衰弱”，直至韩愈才复“西汉之旧”。晚唐五代以后为第三阶段，柔靡之风复盛。宋初继承了晚唐五代的余风，虽有柳开、王禹偁反对“五代文弊”，但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仍统治文坛数十年。苏辙在《汝州杨文公诗石记》中说：“公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祥符间，事业比唐燕、许无愧，所与交皆贤公相，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对杨亿的这一评价是颇有分寸的，一面肯定了他对培养后进之功，一面又以唐之燕、许比宋之杨、刘。而燕、许正是“文气衰弱”，“卒不能振”的代表，可见这一比拟就褒中有贬。经过穆修、石介、尹洙、宋祁等同杨亿的“穷妍极态”、“浮巧侈丽”的斗争，到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又出现了一种“险怪奇涩”的不良文风。欧阳修既同西昆体，又同古文运动内部的这种不良文风作了坚决的斗争：“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以西汉文辞为宗师”（苏轼《眉山远景楼记》）的苏辙兄弟，他们的平意流畅的文风同那些“以诡异相高”的不良文风形成鲜明对比，得到欧阳修的极大赏识：“驰词数千，适当公怀。擢之众中，群疑相。公扈恬不惊，众惑徐开。”（《祭欧阳少师文》）如果说苏辙在参加进士试时，还只是以自己语言质朴，不事雕饰的文风与当时的“辞涩言苦”的不良文风相对抗，那么三年后他在参加制科试时，就进一步直接批判了这种不良文风。他在《进策·民政上》中指责“士大夫为声病剽窃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并认为这是朝廷的科举考试制

度有以启之：“天子之所以求之者若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苏辙在这里讲得相当深刻，科举取士制度是对读书人的指挥棒，仅以声律记问之学取士是造成不良文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西昆体的“穷妍极态”还是“险怪奇涩”的所谓“古文”，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重文字雕琢。针对这一弊端，苏辙特别强调阅历对养气为文的作用。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间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这就是说，为文一要象孟子那样“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所谓的气是一种“配义与道”、“集义而生”的气，偏重于主观的道德修养。理直则气壮，气壮则言畅，可见善养浩然之气对为文是很重要的。二要象司马迁那样，周游天下开阔心胸和眼界。苏辙这封信的重心是强调阅历对养气为文的作用，他说他过去“百氏之书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他在《墨竹赋》中总结文与可的绘画经验时也同样强调了阅历对创作的作用。文与可的墨竹所以画得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荫，观竹之变多矣。”一面加强主观的道德修养，一面增多生活的阅历，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写出好文章。“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在苏辙看来，有意于“学”未必能学成，而通过丰富阅历，充实浩气，溢而为文，自然就是好文章。他在《舟中听琴》诗中写道：“昔有至人爱奇曲，学之三年终无成。一朝随师过沧海，留置绝岛不复迎。终年见怪心自感，海水震掉鱼龙惊。翻回荡潏有遗韵，琴意忽忽

从此生。师来迎笑问所得，抚手无言心已明。”这里的“至人”指古代著名琴师伯牙，“师”指成连。据《乐府古题要解·水仙操》载，伯牙从成连学琴，三年不成，后随师往东海蓬莱，闻海水激荡，林鸟悲鸣，受到启发，琴技大进。苏辙这首诗与《上韩太尉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执笔学文也将“学之三年终无成”，而通过周游天下以激发其志气，“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就自然而然成为好文章。

反对雕琢，并非不要修饰和轻视文章的艺术性。苏辙的《诗病五事》表明，他论诗是兼重道与艺的。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批评了诗歌的弊病，它涉及诗歌的思想内容，如指责李白“不知义理”，孟郊啼饥号寒，王安石以诗害政等等。它又涉及诗歌的艺术形式，如他称颂《诗经》歌颂“征伐之事”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作侧面烘托，而批评韩愈直接描写残杀战俘：“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苏辙还赞美《诗经》写周太王迁豳，写得来“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称美杜甫的《哀江头》“其词如百金战马注坡，募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批评白居易“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可见苏辙主张诗歌反映现实，既应突出重点，有跳跃性，没有必要依样画葫芦，“寸步不遗”，更反对象韩愈那样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又应写得来气象联络，脉理为一，形成完美的统一体。如果说苏辙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论述有较多的道学气，那么他对诗歌的艺术要求，却不乏精到之见。北宋人的诗话，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偏重于记载轶闻佚事，而苏辙这篇类似诗话的《诗病五事》，却偏重于诗歌理论的探讨，在诗话史上也是较有价值的。

苏辙论文还很强调风格的多样性，反对

单一化，主张“文章自一家。”（《开窗》）苏轼的《王维、吴道子画》诗有扬王抑吴的倾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骏，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辙在和诗中反驳道：“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他认为：“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尔。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婉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倾国，马能一蹴致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在苏辙看来，壮马的刚美和美女的柔美都很美，是不同风格的美，不应有所轩轻。其实，苏轼只是在就画工画和文人画作比较时，他更推崇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苏轼曾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可见在主张创作风格的多样性问题上，他们兄弟实际上是一致的。

### （三）

苏辙对北宋文学的又一贡献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八百来首清幽峻拔，高雅闲淡的诗篇。

苏辙早期的作品反映现实的较多。《栾城集》开卷第一篇《郭纶》详尽叙述了郭纶的一生，从中还可看到同西夏的战争与平定浓智高之乱的具体情况。对“屡战有功不赏”的郭纶，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说：“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一夫何足言，窃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可见他不只是同情郭纶个人，而是从朝廷用人角度考虑问题的，担心一夫不赏而影响群雄奋发。他的《夜泊牛口》表现了青年苏辙对民间疾苦的关心：“水寒双胫长，坏袴不蔽股。日暮江上归，潜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饿冷彻曙。”他以非常质朴的语言描写了蜀中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况。苏辙也有

一些讥刺新法的诗篇，如“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次韵子瞻见寄》）；讥刺开河劳民的：“年来尚功勋，智者争雕钻。山河不自保，疏凿非一端。讥河西门豹，仁智未得完。方以勇自许，未卹众口叹”（《和子瞻开河村运盐河雨中督役》）。讥讽朝廷派劝农使四处督耕，骚扰人民的：“滕间白水细无声，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力，多差使者出催耕”（《次韵子瞻山村五首》）。嘲笑王安石欲变梁山泊为良田的：“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梁山泊》）。总的来说，这类直接反映现实的诗篇在苏辙诗中并不多，他写得较多也较有味的是一些抒发个人情怀的诗篇。

《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世罕见。”苏辙兄弟的唱和诗特多，表现出真挚深厚的兄弟情谊。特别是在他们第一次离别期间，即苏轼任凤翔签判，苏辙在京侍父时，他几乎遍和轼诗，后来他们还把这些诗编成《岐梁唱和诗集》。其中第一首是《怀涇池寄子瞻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驢马但鸣嘶。”首联写苏轼赴凤翔任，苏辙送他至郑州西门外，依依惜别。次联写别后自己还京，苏轼赴任。颈联点题，因苏轼将途经涇池而“怀涇池”；自己曾被任命为涇池县主簿，但未赴任；而当年他们兄弟赴京应试，曾共同题诗于涇池僧舍。尾联写苏轼旧地“独游佳味少”，无人共语，只有驢马嘶鸣而已，而自己不能伴兄同游的离愁别恨已溢于言外。苏辙晚年贬官雷州，苏轼贬官海南，相遇于途中。苏轼病瘳，他在《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诗中写道：“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苏轼因病瘳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苏辙为之“一夜再三起”。他们兄弟的情

谊，真可谓老而不衰。

抒写仕途失意也是苏辙抒怀诗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制科考试中因抨击时政而“忤世”，只好辞去商州军事推官的职务。他写道：“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黍周行（仕宦的行使）。学从社稷原非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这是他在仕途上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却能以婉而不迫、怨而不怒的笔调抒发一种淡淡的哀愁。他在贬官监筠州盐酒税时写道：“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凄夜渡江。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夜深唧唧醅鸣瓮，睡起萧萧叶打窗。阮籍作官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雨中宿酒务》）首写酒务繁忙，次写壮心消尽，再以眼前景烘托凄凉心情，最后以自我安慰作结，全诗同样表现得平和婉转，哀而不伤。这种诗风在他晚年闲居颍昌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岭南万里归来客，颍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谁言犹有命，长闲岂复更尤人？眼看时事知难了，手注遗编近一新。点检平生无几恨，浊醪初熟正逢春。”（《岁暮》）不怨天，不尤人，乐天知命，以酒浇愁，著书自悦，颇似白居易的晚年。

苏辙一生还写了不少咏物诗、题画诗。《次韵子瞻视御史狱中榆槐竹柏》四首，皆借物抒怀，寓意深远。其中咏槐一首开头即感慨道：“盛衰日相寻，循环何曾歇？”昨日太守，今朝囚犯，盛衰相寻，感慨万端。接着他具体描写槐树春荣冬萎的境况：“攀条攀柔萸，回首惊脱叶。绿槐阴最厚，零落今存荚。干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但苏辙不甘“枯槁”，安慰苏轼道：“草木何足道，盈虚视新月。微阳起泉下，生意未应绝。”万物都有虚有盈，伴随冬天而来的必然是春天，暂时“枯槁”之后仍将“生意”盎然。苏辙论画贵写意，他的《韩干三马》诗分别描写了三匹马和三位御马者的不同神

态，最后称美韩干道：“画师韩干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他有一首咏蚕的诗，也着重咏蚕的“腹中事”：“饥蚕未得食，宛转不自持；食蚕声如雨，但食无复知；老蚕不复食，矫首有所思。君画三蚕意，还知使者谁？”（《题王生画三蚕、蜻蜓二首》）这里，他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饥蚕、食蚕、老蚕的不同神态，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的思问题。而下一首咏蜻蜓似乎就作出了回答：“蜻蜓飞环环，向空无所著。忽然逢飞蚊，验尔饥火作。一饱困竹梢，凝然反冥寞。若无饥渴患，何贵一箠乐？”蜻蜓饥飞寻食，饱卧竹梢。“使者谁”？——“饥渴”而已。“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华”。（《送张公安道南郡留台》）他之所以战战兢兢地奔走于仕途，也是为“饥渴”所驱。可见即使在这类题画、咏物诗中，也寄托了他无限的感慨。

“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张耒《赠李德载》）苏轼诗有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清幽深邃，“静淡有味”，更接近陶、柳的诗风。

#### （四）

苏辙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特色，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所谓稳，就是立意平允，结构谨严，行文纤徐，语言淡雅。他一生写的大量政论散文就具有这种特点。他的《民政策第二》是一篇论宋代科举之弊的文章，但他却从周、秦民风之异讲起。周代是“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絮，以求为君子”，而秦却是“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鼓之事。”之所以有这种不同，“上之人使然也。”因为在周代要“孝悌忠信”之人才才能“登于有司”，而秦却要“武健壮勇，能斩捕甲首者”才“优之以爵禄”。而“利之所在”，天下之人“皆争为之”。文章的后半部份才讲到宋代“民昏而不知教”，“其

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因为朝廷一面想“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一面却以科举取士。文章主旨至此才完全显露，略加回味就不难看出，其前落笔虽远却紧扣中心。清人刘海峰云：“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纾徐百折而后出之，于此篇可见。”

苏辙一生还写了大量史论，也往往具有这种“纾徐百折”的特点。例如，他的《唐论》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论述一般的历史现象而无只字及唐，但却处处都为后面论唐作铺垫。文章一开头就说：“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周之衰即衰于外重，“诸侯据兵而内无以制”；秦惩周之弊，大搞中央集权，造成内重，结果“奸臣（指赵高）擅权而外无所忌，匹夫（指陈胜、吴广）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后汉高祖惩秦之孤立而行分封，造成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惩封国之祸而分裂诸侯，招致王莽篡汉。总之，他们“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苏辙剖析历代君主的顾此失彼，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宋王朝鉴于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臣特别是武臣的权力。在苏辙看来这无异于以偏求偏：“圣人将有大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文章后一部份才直接论唐，指出唐代“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宝之乱，府兵四出”，才失去内外相制之势。这实际是苏辙为宋王朝开的药方，是“深究利害”的“大文字”（明唐顺之语）。

苏辙的各种杂记、传状，语言精确，形象生动，往往能给人以如临其境，如见其

人，如闻其声的感觉。他的《庐山栖贤堂记》写道：“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岌相倚。”接着写水石相激，其声如雷：“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其险如三峡：“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其形如车轮：“渡桥而东，依山循木，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而栖贤堂则倚山临水：“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堂楹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蒨相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寥寥数笔，就写出了栖贤堂的“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之状，“读之便如在堂中。”（苏轼《跋子由栖贤堂记后》）这是摩景。再看其状人：“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祝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是《东轩记》中的一段，也只数笔就把他贬官筠州期间酒务繁忙，郁郁寡欢，牢骚满腹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一语，深刻表达了他被迫要将功赎“罪”的痛苦心情。而“哑然自笑”四字，更是传神之笔，生动表现了他那无可奈何，自怨自艾，自我嘲笑的神态，含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是写自己。再看他写别人。《巢谷传》，仅以三件事就为我们刻画出一位义士形象。文章先写巢谷弃文学武，已表现得与众不同。次写他与“熙河名将”韩存宝的金石之交，后韩因罪“自料必死”，托巢谷以后事，“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行步以授其子，人无知者。”这已经表现出“缓急可托”的义士之风。最感人的是，苏辙兄弟于元祐年间青云直上时，“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而在他们远谪岭南时，七十三岁高龄的巢谷却自眉山“万里步行”“访余兄弟”。苏辙“闵其老且病”，劝他不要再往

海南，但他却执意要去，结果死于途中。苏辙感慨道：“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是的，正因为他不用辙言，才进一步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文章至此本可结束，苏辙却笔锋一转，以古代义士高恭比巢谷。这样，既使文章顿生波澜，又进一步抒发了对巢谷的敬慕之情。全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但由于选材典型，详略得当，巢谷形象非常鲜明生动。

苏辙散文以冲雅淡泊，质朴自然为主要特征，但不是说他就没有一些刻意为之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黄楼赋》就颇重雕饰。他说：“余《黄楼赋》学《两都》也，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栾城遗言》）苏辙的《黄楼赋》特别是其中的“东望则连山参差”，“南望则戏马之台”，“西望则山断为玦”，“北望则泗水漫漫”一段，确实酷似班固《两都赋》的铺陈排比。不但苏辙“晚年不作此工夫之文”，就是他一生也所作不多。正因为这篇赋与苏辙固有的文风不同，当时就有人怀疑为东坡代作。苏轼说：“（子由）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愤愤者，而或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答张文潜书》）。

袁宏道说：“坡公之可爱者，能其小文小说。”（《苏长公合作》引）较之苏轼，苏辙散文多“高文大册”，小品文不多，但却写得很有味。他晚年闲居颍昌，写了一篇《自写真赞》：

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

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

全文仅三十二字，就写出了他晚年退出政治舞台，以闲居为乐的神情，而“误入廊庙”的“误”字仍使我们隐隐感到他的不平和后悔。《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是苏辙的两部笔记文，但与同为笔记文的《东坡志林》不同，多记国家大事，《略记》主要记他自己所参与的各项政治活动，《别记》则记前贤、时贤的轶闻轶事。其文学趣味虽

不及《东坡志林》，但史料价值却远远超过《志林》。《西庵提掇》说：“朱子（熹）生平以程子（颢）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见矣。”与《东坡志林》不同，这两部笔记的行文一般较长，但也有一些短而有味的篇章，如：

贾昌朝始作国子监直讲，孙奭判监。昌朝尝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路随》、《韦处厚传》示之曰：“韦论乃相见。”既见，奭曰：“知此意否？足下异日以儒术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谓奭能知人。

然其名位则类矣，而邪正则未也。若止论贵贱，此但相卿所能耳！

这则笔记，前段记事，谓孙奭知人；后段是苏辙的反驳，言孙奭仅知贾昌朝后来的“名位”，而不知其“邪正”，因为贾昌朝为相，多与官人、宦官相勾结。接着苏辙进一步反驳，如果仅知“名位”“贵贱”而不知其“邪正”就叫做“知人”，那么看相算命者也可叫“知人”了。全文无论记事还是议论，都非常洗炼，特别是议论部份，简劲峭拔，戛然而止，可与王安石的名作《读孟尝君传》媲美。

## （五）

苏辙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是与整个北宋中叶文学的繁荣分不开的。北宋中叶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有六家出现在这一时期；也与西蜀的文化繁荣和受五代文弊影响较小分不开，正如苏轼所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四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眉山远景楼记》）这正是八大家中的六大家，有三大家出在西蜀的重要原因。也与家学渊源分不开，苏洵鉴于自己少不喜学，老大无成的教训，一面自己

大发愤，一面精心培养二子，结果是“一门  
歌、向传家学，二子机、云并隽游。”（张焘  
《老苏先生挽词》）

但更重要的还是苏辙自己的刻苦努力。  
他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  
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  
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  
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  
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  
焉。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学。”  
（《历代论引》）苏辙一生的仕途比苏轼还要  
曲折。他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二岁应制科  
试入等，可谓少年得志。但以后却沉沦下僚二  
十余年，初因制科试抨击时政而闲居养亲，  
继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任幕僚，后又因苏  
轼入狱而连坐贬官。苏轼在神宗朝还曾三典  
名郡，而苏辙年近半百才是一个小小县令：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学催科愧庙神。”  
（《初到绩溪……呈诸同官》）但在元祐年间，他  
比苏轼还升得快，短短五六年间他就由县令  
而跃居副相。但接着又是贬官七年，放闲十  
二年，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当他能“施之人”  
时，他就尽力以自己所学“施之人”，元  
祐之政，“公之力居多”（《苏文定公谥议》）；  
当不能“施之人”时，如两次贬官和晚年闲  
居颍昌期间，他就“以其所知著之翰墨。”而  
他一生曲折复杂的经历又大大丰富了他的创  
作，他贬官筠州期间作诗四百二十余首，占  
其诗歌自数的四分之一强。苏轼的创作高潮  
在贬官黄州期间，苏辙的创作高潮在贬官筠  
州期间。“诗穷而后工”，坎坷的仕途是他  
们政治上的不幸，但却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的  
大幸。

文 海  
拾 零

## “机巧”试解

陈斌 何世英

高中语文第三册《张衡传》中“衡善机巧”一句，课  
本将“机巧”注释为：“机械方面制造的巧妙。”依此注释，  
好些参考资料便译为：张衡擅长机械制造方面的巧妙。  
“擅长……巧妙”是说不通的。这里把“巧”字讲错了。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释为：“机巧，机械技  
术。巧，技巧。”此注极是。《说文解字》：“巧，技也。”  
《广韵》：“巧，能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巧，  
技也。技巧也。”《辞源》、《辞海》、《古汉语常用  
字典》等工具书均将“技也”列为“巧”的第一义项，可见  
它的本义是“技术”、“技能”，而“精巧”、“巧妙”则是它  
的引申义。在“衡善机巧”这个句子中，“巧”用的是本  
义，即“技术”、“技能”，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张衡擅长于

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巧”的这种用法，在古代作品  
中是不乏其例的。如：

《考工记·总序》：“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商君书·外内》：“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

《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  
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以上诸例中的“巧”均应释为：“技术”、“技能”。稍后  
的同样是记述科学家事迹的《马钧传》，文中用了十四个  
“巧”字，其中除“巧则巧矣”（言诸葛亮所制连弩）讲作  
“精巧”外，其余均应作“技术”讲。